
阳明人黔前的黔中文化与文化人¹

王晓昕

【摘要】：对阳明入黔前的黔中文化的考察，至少可从两个方面入手加以展开：文化本身以及从事文化的人。文化本身的考察则主要以儒、释、道三学的传播与开展为中心，其基本结论是在儒学方面：一是无学理可究，只在教民化俗；二是除“汉代三杰”外，既无名儒可举，亦无卓著可考。随着移民潮的来临，佛道二教亦在黔中发展开来。黔中的文化人则可梳理出三个不同阶段，即“汉代三杰”“唐至元”“明初至明中”来加以描绘，这些文化人，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大大小的文化人纷纷汇入到业已形成的儒、释、道三潮中，已然成为了阳明心学催生与黔中王学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王阳明；黔中文化；文化人；儒；释；道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7）06-0001-25

就在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先生进入贵州之前，被称之为“蛮夷之地”的黔中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大明帝国，虽然在公元1413年，贵州作为帝国的第十三个省而挂牌，但仍有所谓“黔中乃‘三野之地’”之谓：一“野”乃“朝野”之“野”，黔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黔中远离帝国经济中心。不过，如仅就文化因素而言，也并非毫无可述之处，明洪武以来，贵州迎来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朱元璋令傅友德大将军率三十万部队入滇黔，部队家属随迁，使原来人迹稀寥之地渐渐有了生气，作为文化要素的传入，一个较突出的现象就是儒、释、道三教的兴起，成为后来阳明学在黔中产生的文化土壤和思想因缘。然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文化的承担者，只能是如斯时代和如斯地域的个体、活生生的文化人和文化人的族群与群体。

一、黔地文化：以儒、释、道三学为中心的考察

了解儒、道、释在贵州传播的基本情况，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中古以来黔中士阶层的形成及黔中王门产生的本土思想根源。之所以将阳明入黔作为一区域学术史阶段性划分的标志，正如笔者之前所言，认为自包括尹珍在内“汉代三杰”至学术发端而后千数百年间，黔中学术之脉动向呈低调态势，因王阳明的到来，而使明中晚期百余年间，贵州学术乃蔚成一前所未有之高峰。儒学和其他宗教学术文化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柏怀思、王路平等人在《贵州宗教史》前言中所言：“贵州位于中国的西南部，是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一个省份。东毗湖南、南邻广西、西连云南、北接四川，境内山峦重叠，素有‘西南之奥区’之称。贵州历史上移民人数较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复杂，自然环境独特，保存着丰富的民族民间原始宗教，为各种宗教在贵州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贵州境内现有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就是在贵州这片独特的地理环境下，而不断进行传播、发展和演变的。”^[1]儒、道、释三学是中华文化之三大主流形态，黔中与全国一样，历来受此三学之影响至深至广，尤其是有明以来。考察阳明入黔之前儒、道、释三学在贵州的传播与影响，交代阳明入黔之前贵州思想、文化、教育与学术的大致情形，对于了解和分析黔中王门的产生与形成十分必要，以下分别述之。

（一）阳明谪黔前之黔中儒学

¹【作者简介】：王晓昕，男，贵州贵阳人，贵阳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贵阳 550000）。

关于儒学最早传入贵州的时间，尚无确切定论，有“战国说”，有“前汉说”，有“后汉说”，甚至于有“隋唐说”。《华阳国志》载，东汉尹珍（字道真）“首开南疆之学”，以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的儒学经纬教谕士民。故甫一伊始，黔地儒学的传播就是以教育方式展开的，其中又以学校教育为其主导。黔中人文生态环境始得以改善。据《贵州通史》记载，在东汉之“往后很长时期中，学校教育并未见发展的记载。宋室南渡后，贵州教育稍有进展，播州土官杨氏子弟乃多读书，‘建学养士’，修建孔庙，‘留意变俗’；地近四川的思州所属沿河地方，建有鸾塘胜院。元代虽一度倡导儒学，下令各路设立学校，但因贵州时为湖广、四川、云南三省毗连之地，政区累有变迁，实际设立的只有顺元（治今贵阳）、普定（治今安顺）和播州三路儒学”^{[2]337}。

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谕中书省臣：“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儒师，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教。”^①因此，儒学于贵州的传播自始开端，继而勃然兴起，一批卫学、司学、府州县学、社学及书院相继建立起来，并以强调儒学之教化为主打内容，同时“不断向国子监输送生员，同时开科取士”，贵州“教育状况大为改观”^{[2]338}。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布政司正式设立，贵州虽成为全国第十三个省级行政单位，但之后数十年间，学校仍由云南提学副使代管，迨弘治四年（1491），方由贵州兵备副使行兼管之职。阳明莅黔前夕，已有专司贵州提学副使之职^②者，此为后话。明太祖朱元璋尚对初定之云贵的教化民如何纳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特布诏谕：“王者以天下为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迩，况普定诸郡，密迩中国，慕义来朝，深可嘉也。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人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使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③“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正是儒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亦是明初统治者急待匡定天下、规范人心的既定之方。和全国的官方指导思想——儒学——传播形态一样，汉以来儒术中纲常伦理、礼乐教化一套显然为儒学甫入黔中之后的最初文化形态。至于尚属高明一路的所谓宋儒格物致知之学，于黔中传播的可能性是不大的，目前也无任何文献资料可以做出较丰之证明。从洪武始，历建、永、成、弘诸朝的“明朝各代皇帝莫不遵循这一祖训，把推行儒学教育作为巩固边疆的‘长治久安’之策，三令五申，施行‘教化’。并按照‘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要求各级地方官吏重视教育，努力办学。凡政治力量能达到的地方，皆设官学，建立学校，修建孔庙，开设科举，体现‘怀柔远人’之意，达到‘建学校以化夷’的目的”^{[2]339}。

可见，阳明入黔前的贵州儒学之传播与儒学之教育，显有以下特点：一是无学理可究，只在教民化俗。宋元以降，尤其明初以来，在中原广为传播的程朱理学，不仅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而且作为科举取士的指定功令，被广为流布。“明代的科举考试在历史上最为典型，在科举的推动下，理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1}在中原文化发达地区，“明初理学，以朱熹学说为依归。学者由对朱熹‘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为学纲领的不同侧重，分为致知与躬行两派。前者以格物致知、博学多识为功夫进路，后者则重在居敬存诚，涵养心性。功夫途径皆不出朱学范围……”

[3]1

黔中地处偏僻，民风尚待开化，文化的首要任务自然不在学理的考索，更离所谓学派分殊为之甚远。无学理可究，只在教民化俗，当是明初直至明中叶黔中儒学传播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延续实应戛然而止于阳明先生之龙场悟道。因为“龙场悟道”这件事情本身，无论是就阳明个体思想的进路而言，就黔中学术文化的开发而言，还是就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转向而言，皆毫无疑问地是真正属于具有学理性意蕴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一点，历来学者多已有所识。从个体思想的进路上看，陈来认为，阳明在回顾早年思想的开展时曾说，他直至龙场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④（《年谱》戊辰条）。这表明，从弘治二年（1489）己酉谒娄谅为格物之学，至正德三年（1508）戊辰龙场之悟，青年阳明的心路历

^①①《明史》卷四十五《选举一》。

^②据《王文成公全书·年谱》（王晓昕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等多处文献记录，其时已有毛科任贵州提学副使一职，后又有席书接任，是为正德初年之史实。《贵州通史》曰“到嘉靖年间始设贵州提学副使总管全省文教之事”一语，显有误。

^③①《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50，第6页。

^④陈来先生于“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十字下，均加有着重点。见氏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程一直为心与理的问题所困扰……这对（阳明个人）以往的哲学立场，无疑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4]20}如果说龙场以后的阳明思想主要致力于在儒家的立场上融合仙佛，那么，龙场之前阳明思想的主要课题就是如何扬弃宋儒格物之学以重建心学。终阳明一生，他的思想的主要课题始终是批判宋学的支离与吸收佛道的智慧两者，而他对宋学的不满正是基于他自己青年时代“为宋儒格物之学”的实践。^{[5]296}“如果说朱子到了 40 岁学问大旨始定，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只是到了谪居龙场时学问大旨始定，从此，阳明学术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性格。”^{[4]299}

也有学者认为“龙场之悟，是王阳明一生数次学术宗旨变化中体验最痛切、对他意义也最大的一次。龙场之悟的直接结果，就是阳明看到了道德意志在生死患难中的巨大作用，他悟到的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龙场之悟，是他心外无理说建立的根据。”^{[3]89}

就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而言，更多的人把阳明龙场悟道视为一重大发展与转向者。至于提到阳明龙场悟道对于黔中学术文化的开化与发轫，讨论者并不是很多。下列见解有独到之处：“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是黔中王门形成的重要契机。”又道，“‘龙场悟道’乃阳明早年思想变迁之一大拐点，故称黔中为王学之‘始基’，实不为过。而‘过化’即教化，是就阳明之‘为教’而言，‘悟道’是就阳明的‘为学’而言。如果说‘过化’强调的是阳明在贵州的教育开化，那么，‘悟道’便是凸显阳明在黔中的思想创设，它对黔中地区在阳明学形成过程中之重要性的首肯是显而易见的……”^{[5]352-354}

说到“思想的创设”，在阳明到来之前，黔中少有学术，更无“思想之创设”，有的只是开民成务之教化，也只是在最低限度的层面，且也是在明洪武以来才有所凸显。贵州历史上有文献记载以来，开问学之端倪与行化民之教谕者，唯有东汉尹珍（字道真）一人可得而书之^①，已有的文献资料证明^[6]，其人对西南广大地区的教化确有开创之功……元代统治者渐知以儒学进行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始识“农桑、学校为政之本”，继而大倡儒家之学。不过在贵州留下的却几乎是空白。元代在各行省所在地设立儒学提举司，统管各路、府、州、县学校及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又得考校呈进著述文字，置提举一员、副提举一员，各路设儒学教授一员及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元初，蒙古都元帅纽璘驻守成都，居然极力提倡儒学，又在杜甫草堂、杨雄墨池、文翁石室等处建立学宫，以至解囊出资收购图书三十万卷，仅草堂就建有书院三所，各处书院日多。贵州的情形无与其比。虽有播州^②得风气之先，其地儒学一时兴盛起来。《大元一统志》载“（播州军民安抚司）宦户、儒户与汉俗同”^③，文中提到“儒户”，即教职人员，数量可观，《遵义府志·土官志》记载了作为元播州宣抚使的土司杨汉英，其“急教化，大治泮宫，南北士来归者众，皆量才用之。他喜读濂洛书，为诗文，尚体要，著《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当然，提到的这些著述均不见实物，是否真正曾经存在也未详考，故不能据此推翻阳明入黔前无学理可传的判断，但却可肯定教民化俗之实存。从元代至前明的一百七八十年间，特别是到了明代，朱元璋的大力倡导，以儒学教化民众的任务在渐次推广，黔中以及周边地带亦建文庙、讲经史、授学田，民风丕变，诸如设孔子庙，置学舍，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行释礼，人习礼让，等等渐成风气。地处贵阳而久负盛名的“文明书院”，据查就是元末明初所建。明（嘉靖）《贵州通志·学校》载：“文明书院在治城内烈烈桥西，即元顺元路儒学故址。”又有明代《重修顺元儒学记》断碑一通，尚言文明书院曾由何成禄所建。蒋信^④书《重修文明书院记》，提到“左有旧文明书院荒址”一语，皆可为明初行教民化俗之确证。

二是既无名儒可举，亦无卓著可考。上文提到尹珍，字道真，乃东汉人士。郭子章（1542-1618，字相奎，号青螺^⑤，又号

^①尹珍之前，贵州的文人留于记载的，还有舍人与盛览，但仅凭现有证明材料，都不足以称之为“开问学之端倪与行化民之教谕者”。

^②播州地处黔北，乃今遵义大部地区，当时属四川管辖。故笔者称元代贵州儒学教育尚属空白，是有一定根据的。

^③《大元一统志·卷十》之《播州军民安抚司》，《贵州通志》1998年版。

^④①关于蒋信其人，本书上篇第三章将作详细介绍。

^⑤郭子章，号青螺。因其家乡附近有青原山和螺子山而自名。此两山均为江西省吉安府的名山，自号青螺，以志不忘家乡之意。据《吉安县志》载，青原山位于老县城（今吉安市）东南 9 公里，赣江之东，属嵩华山脉，海拔 116 米。螺子山位于吉安市吉州城北，东临赣江，其主峰海拔 143.9 米。郭子章在《豫章诗话》中对自号的用意做了如下解释：当自己青年求学时，天天都

嬪衣生，江西泰和县冠朝乡冠朝村人，明万历贵州巡抚）《黔记卷一·大事记上》载：“桓帝，胖柯尹珍为荆州刺史。”李独清^⑥先生引济南田雯曰：“黔之人物，尹珍以上无论已。”^④李先生有曰：“吾黔僻处南服，早属荒裔……”尹珍（79-162），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县人。东汉和帝永元十一年（99），尹珍到京师洛阳，拜著名学者许慎为师，学习儒家经典。学成后返回故里置办学校，成为黔地首开教化第一人。由于尹珍对贵州教育事业的贡献很快引起东汉朝廷的关注，亦获当时学者之赞誉。按照东汉时代的官吏任用制度，尹珍获得了贤良方正举荐的机会，任尚书承郎，后又在武陵郡太守应奉的推荐下出任了荆州刺史。而尹珍在应奉属下任职的同时，又拜应奉为师继续修习儒学，逐渐成为当时一代名儒。后尹珍弃官返乡，继续以教学为之职事^⑤。据此认为，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虽可追至东汉，但尹珍中后，直至阳明入黔，其间千五百年间，实无名儒可举矣。

有《思南府志》记载：“宋政和间，藩部长田佑恭被召入觐，进止不类远人，徽宗异之，问其故。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⑥这说明，早于宋代，已有夏大均一类儒士于黔东北思南一带传播儒家文化^{[7]31}。但夏大均之名，毕竟闻者罕矣。明初有田氏土司田仁智统治黔东北地区，其尊朱明王朝“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之要求，派出土司子弟抵京读书，学习儒家文化思想，之后回到地方，继承土司之职。田氏土司还兴办学校，传播儒学，并于永乐五年（1407）在贵州设立了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儒学。^{[7]31-32}夏大均也好，田仁智也罢，后人断不可轻忘之，毕竟与尹珍、阳明难以比论。郭子章《黔记卷十四·艺文志上》曰：“黔自立国以来，人文未著，作述亡考，至我明郁郁乎盛。名公茂士，扬挖二酉，搜罗百家，蜚声作者之林汇，皆有集可传。至迁客流人，如王伯安、郎尔瞻之类，著述于黔者，皆为山川增采。”王伯安即王阳明，部尔瞻即邹元标（后文有述），如此名儒当然只是阳明入黔之后的事情了。所谓“无卓著可考”，有见于郭子章《黔记》，其《卷十七·学校志》云：“昔日之黔，未有文也。”又云：“可以马上治之，迩来圣化大行，青衿日广，而提调者多系介胄之辈，此辟之方圆冰炭，其奚入焉？至名宦乡贤，乡饮节孝诸关大典，尤宜慎重。”由此可证，并非虚言。

三是一应军政所需，辅之开科取士。正统八年（1443），贵州设永宁卫，以本卫军生附宣抚司学，其科贡，民隶四川，军隶贵州。嘉靖二十二年（1543），平溪等五卫军生，暨宣抚司民生，称去各该省会险远，比例就近附试，该提学副使蒋信、谢东山，先后议呈两院题奉钦依勘合，卫司生儒俱赴贵州应试，其宾兴银两，仍应办于各该卫司。寻以云南、广西学近贵州境者复求附科，御史孙袁请行禁止，部覆报允，令贵州乡试，邻省不得再行请附。明初以降之百余年间，贵州一直作为开疆拓土之军旅之地，随着大批来自北部和东部的军士及其家眷的不断移入，乡试的设置，开科取士遂成为一种辅求。但在阳明到来之前和阳明到来的一段时间内，地方上的屡屡疏议并未立即获至上允，直至嘉靖十四年（1535）方得尘埃落定，贵州终于设立了乡试场所^{①7}。然此之前，黔中虽有府学，但无乡试，贵州学子跋涉重山，远赴滇国应考，实在苦不堪言。

四是官学以学校为载体，为儒学传播与教育的重要阵地。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载：“嬪衣生曰：元以前，黔故

要往来于住家和县城之间，罗文恭公书“白鹭青螺之会”六子每入眼帘，长成后遂以其中“青螺”二字为号。

^⑥③李独清，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生前花了很长时间和大量精力，研究孙应鳌的全部著作，广泛搜集正史、野史有关记载以及明代其他作家诗文集集中的有关材料，撰成《孙文恭公年谱初稿》，先于1939年和1940年在《贵州文献季刊》第二、三期合刊和第四期上，刊布了嘉靖四十年以前部分。此后，李先生又续写全稿，并对已发表部分作了扩充，到1960年始竣。李先生逝世前，又先后对此稿作了多次修改。李先生生前曾参加民国《贵州通志》的修纂工作，对有关贵州的古籍文献十分熟悉，对贵州作家研究颇深。

④李独清《孙应鳌年谱·自序》。

⑤尹珍居家办学的遗址和遗存至今尚存，后世为纪念其首开之功，为他修建了纪念物，成为如今黔地名胜。民国时期，黔省将原正安县一部分划出，以尹珍字作县名曰“道真”，以资纪念。

⑥（嘉靖、道光、民国）《思南府、县志》，思南县（府）志编撰委员会2的2年版，第69页。

^①①郭子章《黔记·大事记》嘉靖乙未十四年秋七月条：“定贵州解额，开科本省。解额二十五人，从巡按王杏请。”这一年，朝廷正式确认贵州考生的举人录取名额并允许贵州省可以在本省独立举行乡试。郭子章按：此次朝廷下达的贵州举人录取名额总数为二十五名，其中二十一名来自此前拨给云、贵两省联合乡试中的贵州名额，另外四名则是在此次审议时给贵州追加的名额。朝廷的这一决定是因为时任贵州巡抚王杏上奏请求贵州独立举行乡试，朝廷方予准行。此成为贵州文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大事。

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黔之学自元始，元有顺元路儒学，有蔺州儒学。我明洪武二十六年，设贵州、思州二宣慰司学，永乐间废田氏，思州宣慰司学亦废，已而，思南、思州、镇、铜、黎平五府学以次建焉。比各卫州县学亦以次建，中间沿革具详各学。万历二十八年播平，又益以印江县学，又议改平越卫学、普定卫学俱为府学，又设黄平州学，新贵县学，而学益备。通一省论，有卫而无学者，贵州、贵州前卫、永宁、普安、清浪是也；有州而无学者，镇宁、永宁是也；有县而无学者，镇远、施秉、铜仁、余庆、瓮安、湄潭是也；有卫学改府学者，都匀、平越、普定是也；有先有学而后革者，永从是也；有先为府学后为州学者，定番州是也。嗟乎，上之人，不难捐廩饩、其故殆难言哉。”故黔中各地的学校设置情形大抵如此。

前面谈到因军旅迁徙之需而有学校之设立，初土官子弟并不能享此同等待遇。渐渐地，情况才逐步发生变化，土官子弟入学才成为现实。郭子章《黔记》有“成化十七年，令土官嫡子，许入附近儒学”的记述。

各地开始越来越多地设立学校。“定番州儒学，先为程番府学。成化十一年，知府邓廷瓚建于城中。弘治初，知府汪藻迁建于西南隅。嘉靖十五年，知府林春泽建于中峰书院故址。今府移入省城内，改为州学。”^[8]

贵阳府儒学，成化间建于旧程番府，隆庆二年（1568）迁府入省，学制、殿庑、祠祀与宣慰司共之，而以司学右阳明书院为明伦堂。万历二十一年（1593），布政王来贤、提学徐秉正、知府刘之龙议呈抚院林乔相、按院薛继茂，建于北门外贵州驿文庙，在明伦堂后，启圣、乡贤、名宦三祠附之。^[8]

巡抚江东之《贵阳府新建儒学记》曰：

明兴二百年来，声教丕隆，蒸沦翔洽，诂惟函华輦悦，即穷蕃荒服，亦胥渐被。盖家铉户诵，其磅礴匪朝夕矣。黔中，古西南夷地，自高皇帝辟乾户肇造后，遂得列为藩服。虽治杂汉夷，乃百司庶政概视两都诸省，有差无异，而贵阳尤黔省首郡，故样柯程番地，更始于穆考御极之三年。明年秋，始设学，如会甲，一时规恢未备，姑就阳明书院改署明伦堂，群博士弟子员讲业其中，若圣庙贤庑所为瞻礼陈乐也者，则第因宣慰而贵阳附焉。夫使邑学隶府，犹曰俭制，岂其改郡改名而于弘风训典之要地，顾让而未遑耶？大都崇儒表正，在朝廷作兴倡率，在有司而尽制备物，又自有时为之乎。

为兴学校，子章曾上书皇上：“一议建学校，以化夷民。臣等会看得黄平等司属播，时逆龙禁文字，仇儒生，以故民多弄兵，鲜知向方。顷播平，时臣等会题以平越卫学改平越府学，黄平州另建一学。又该前巡按御史宋兴祖题将安顺州改安顺军民府，新设平越府，州县建立学校。山西道御史李时华题将新贵县增设一学，备准吏礼二部咨移到臣随行。据布按二司提学道经理道府会议前来，该臣看得建学育贤，化民成俗首务。今据司道会议，改平越、普定二卫学为平越、安顺二府学，增设黄平州、新贵县二学，裁平越卫学训导，改黄平州学学正，裁宣慰司学训导，改新贵县学教谕。此一转移间，不烦官帑，允宜建设。黄平州学，除土司土著子弟照旧收考外，其新民子弟，须照礼部题准近例，二十年后方准收考。今据司道府会议，黄平等州县乃新造之邦，土著鲜少，礼义不知，新民子弟目前准其收考文理平通者，止许入学，不许观场，待二十年方许入试。既不失化诲夷方之意，又不碍冒籍中式之例，似应俯从。其平越、安顺二府学廩额、贡期，准如都匀府学例，各廩二十名，一年一贡。黄平州学准廩拾名，二年一贡。须在十年之后方准起贡。二卫学印记当改为二府学印记。”^[8]“至于增解额一节，迩来黔中文教渐昌，庠序日增，且会试中式不下于粤滇，而乡试解额独少于二省，似应于原额量加。乞敕礼部覆议，将贵州解额量增，以广圣化等。因题奉圣旨，该部知道。”^[8]“社学”也是官学之外儒学教化的一种学校形式。江东之曾忆言曰：“社学在城内忠烈庙右，万历二十五年，提学沈思充、新贵县知县张羽鸿建。”^[8]

除官学（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外，更有较早的司学存在。故有“新贵县学在司学右，新贵故无学”^[8]一说。

“司学”是黔中学校形式之一大特色。洪武二十八年（1395），监察御史裴承祖上奏曰：“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平浪等长官司……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知报本之道。”^①事实上，司学仍然是官学的一种特殊形式。^②官学以学校为载体，成为

儒学传播与教育的一大阵地。^③

贵州宣慰司学为全省之冠。论其历史，元代已有基础，初明即建司学，历经两百多年，为黔中司学所存时间最长者。论规模，其明伦堂、大成殿、两庑、四厢，一一齐备，其尊经阁内所藏《五经大全》等书，为时朝廷颁赐，两座石塔乃仿唐代雁塔，文庙宏伟，又有名宦、乡贤二祠，在省内首屈一指。^{[2]354}

在儒学教育中，尤重土司子弟教育，这显然与当时的土司酋长制度息息相关。然教化之内容却不容半点通融，一应为官方指导下之四书五经教材，“大一统”的价值诉求是教民化俗之核心理念和主流意识。^④为了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鼓励创办学校以传播儒学，并通过改革选举制度选拔儒学精英人才，确定考试科目。虽说有学者认为：“在儒家学说中，宋代的程朱理学将封建纲常化为主宰万物的精神实体——‘天理’，它比先秦的孔孟学说、汉代的经学、唐代的儒学更加精密，更具哲理性，更加适应明初在战乱的废墟上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社会的需要，因而受到朱元璋的青睐。”^{[7]33}在阳明入黔之前，黔中士子为了科举的需要，关注于程朱之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要说形成学理，乃至学派之格局，则是几无可能。为使治国平天下所需的“大一统”思想价值诉求在黔中得以具体贯彻实施，对于明代统治者来说，大力传播儒家文化的真正目的实际上只有两个：一是“将儒家文化加以发展，使其与科举取士制度、学校教育相结合，使学校进一步成为科举的附庸”；另一则是“采取种种措施在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加强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7]44}

（二）阳明入黔前之黔中佛学

贵州历史悠久，为华夏第十三省。东汉初年，来自西方之佛教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本土之儒道两学激荡碰撞，渐成合流之势，降于隋唐，三教堪称鼎立，释佛一度大成气候，几显压抑众学之势。

以下简要对明洪武至正德初年（1506）（阳明入黔前）将近140年间佛教于贵州的大致情况做一回顾。

一是佛教传入贵州的时间。佛教甫入贵州，全然与中原不堪同步而晚了七八百年。佛教虽自中唐传入贵州，教系来自川蜀，但只在今黔北一线，直至宋末，均未能跨过乌江。贵州最早进入佛教的地方，莫过于播、思二州（二州均处于乌江以北）。播州于中唐则有佛教开始盛行，所建寺庙不在少数。佛教于元代开始向乌江以南传播，“而寺庙仍很稀少”^{[2]367}。较有声势的传播进展，是在有明初年。播州宣慰司颇重佛教，除重修宋、元古刹外，“又新建湘山寺（大德护国寺）、复兴寺（瓦厂寺）及真安慈化寺、桐梓龙居寺、绥阳辰山寺等十五所寺庙”^①。这时候，不仅府、州、县、卫均有佛寺，土司地区也不例外，佛教渗透到了穷乡僻壤。针对边远落后地区，明太祖朱元璋秉之以“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方针，即以儒学教育为主，辅之以佛道二教，以“得远人之心”“使人日渐教化”而“化愚民”“弥边患”，从而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故而致使明初以来“佛教在贵

^①洪武二十八年（1395），监察御史裴承祖奏。《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202，第3页。

^②根据土司的设置情况，尚有宣慰司学、宣抚司学、安抚司学、长官司学等不同名目。司学与其他官学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其设于土司管辖区域；二是其主要对象乃为“土生”，且不同区域之“土生”尚有不同称呼：称“罗罗生”的，系为乌撒土府之司学对象；称为“罗罗、焚人”的，则多为平浪等长官司学中的“苗民”；永宁宣抚司学称“俱土僚夷人”，而镇远府属各长官司学亦多为“夷人”；三是“土生”与一般生员有所不同，由于语言不通，颇难施教，加之“土生”生员程度不一，有“童蒙人学”者，有“习礼土生”者，有“于例不考”者，故难以统一施教。黔中乃土司众多之地，除贵州（今贵阳）、思州、思南、播州四宣慰司而外，尚有土司与长官司若干，故较之他省，司学于黔中实更为特出。据《贵州通史》第2卷，第35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

^③“社学”作为半官方或非官方的学校教育形式，其产生为阳明入黔之后事。正嘉后，贵州民间书院兴起如笋，此为后话。最早建于元代的贵阳文明书院，应属官办。另一说则以为：“弘治十六年（1503），毛科任贵州按察司副使，首开建书院之风，在贵阳兴建文明书院，在铜仁建铜江书院。接着，程番府知府汪藻在定番城内建立中峰书院……”等等（见史继忠主编《贵州通史》卷2，第357页）。

^④这一点，从王守仁于正德初在黔中所撰《象祠记》中明显可见。

州的广为传播，其盛况非宋、元时所能比拟”^{[2]367-368}。

二是继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僧侣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南京中央政府设立了僧录司，置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各一人，掌管全国佛教。相应地，各府设僧纲司，置都纲、副都纲各一人，管理本府寺庙寺僧；州亦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有僧正、僧会各自掌理。一应僧纲、僧正、僧会等司职，均置于当地大庙中，不再另立司署。贵州的第一个僧纲司，实际上是在永乐八年（1410）方始设立。建文四年（1402），播州宣慰司（其时属四川）率先请设僧纲司，虽获批，然于永乐五年（1407）方立，仍属四川管辖。贵州宣慰司僧纲司设立之后三年，即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建省，以后各府、州、县、卫是否建有僧官机构，未见文献记录。从已有文献资料可证，“在今贵州境内，最先建立僧纲司的，是当时四川布政司所辖的播州、乌撒、永宁和贵州宣慰司，其他地区的僧纲司是在贵州布政司建立以后才陆续增设的”^{[2]368}。

除了各级管理机构的设置外，对僧人的内部管理制度规定也渐趋严格和完善。洪武二十四年（1391），中央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对寺庙、度牒、戒律、诵经方式乃至施主布施金额等都有了明文规定，违者将受到重罚，其中特别是“限僧三年一度给牒”一款，对全国包括贵州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之推动。仅以正统十一年（1446）中央再次大规模颁发度牒为例，光是赐给贵州会诵《法华经》《心经》及能做瑜伽法事者土僧童即达四十九名度牒^②。又成化二十一年（1485），礼部请行补给贵州僧、道度牒尽达一千之多^③。不过景泰以后，度牒制度渐废，代之以应允僧人“鬻牒”，外乡人往往通过捐纳钱粮便可入黔为僧，如景泰三年（1452），“诏令僧人有愿赴黔纳米五石者，给予度牒”^④。由于内地流入贵州的僧人与日俱增，贵州的佛教事业得以某种程度的发展。曾与王阳明多有交往的宣慰使安贵荣，亦积极崇尚佛事，“成化年间，安贵荣在水西建立佛寺，今尚存残钟一口”。成化二十一年（1485），安氏“又与夫人奢豚于水西境内建永兴寺，并仿贵阳大兴寺铸铜钟一口悬于寺内，其上铸有两种文字，并有‘朝暮德鸣，以镇一方，尚祈佛佑，俾我子孙代’等字样”^{[2]367}。可见明初至明中叶，佛教在贵州的发展，不仅从体制上得以完型，甚而延伸至少数民族地区。

三是佛教在黔流布之派系与佛理。观佛教历史，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教中有宗，宗中有派。传入贵州的佛教也不例外，而主要可区分为两大支派。一是注重个体心性修养的禅宗一派，一是强调教化而作瑜伽法事的密教一派^⑤。明洪武《御制玄教立成醮仪文序》曰：“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正因为佛教的“教”与道教的“正一”是“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故洪武从其治国安邦、教民化俗立场出发，认定其“益人伦，厚风俗”，因而“其功大矣哉”！可见，朱元璋对“禅”和“教”的态度是很明确的，禅宗“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故而不宜提倡；作瑜伽法事的“密教”因能“益人伦，厚风俗”，有利于治国安邦，故可大加扶植。因而在明初于全国范围内，出现抑禅扬密之倾向，也就不足为怪了。

贵州的情况大致如此，不过仍要慢上半拍。“抑禅扬密”的情形在这里并不明显，而是或多或少“禅”与“教”相行不悖，或相互交融混杂。直至成化、弘治间，方渐渐突出“瑜伽势头”。《（嘉靖）贵州通志》中记载的“广能，兴隆僧”，郭子章《黔记》中记载成化间的箬笠僧，皆传说能行瑜伽法事。至此黔中密教始盛，以至正统间向僧人授度牒，多对“能行瑜伽法事”的“土僧童”予以关照。瑜伽传入以后，很快步入民间，影响到民风民俗，以至于民间丧祭之事，多以佛法度之。阳明入黔前，临济宗在贵州尚未兴盛，贵州方志中所记高僧，多为“行瑜伽法事”之密教僧人^⑩。

^①①见（道光）《遵义府志》寺庙部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②《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142，第1页。

^③《明实录·宪宗成化实录》卷269，第6页。

^④①《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16《景泰附录》34，第20-21页。

^②诚然，亦有两方面兼修并行者。如阳明先生在黔所成就之业绩，即创心学之始基与行教化之作为，皆可书之。此点，与佛教传入之两运暗合。

^③嘉靖以后临济宗于黔中渐起，以至隆万后士大夫之掀起参禅之风，虽不能说与阳明在黔建立心学始基之悟道与弘道有直接关联，但此时佛教自身开始注意调整各种内外关系，对外大倡儒、释、道“三教合一”，对内则消除临济宗与曹洞宗的纷争，同

（三）阳明入黔前之黔中道学

《贵州通史》认为，“道教在宋代即已传入贵州”，不过并未罗列出所据之史料，只是说：“但由于当时广大地区尚属‘羁縻州’，未能深入，仅局限于乌江以北的思州和播州”^{[2]379}。同时还说：“到了元代，传播范围扩大，越过了乌江，不但在播州所管的真州、黄平、瓮安等地建立宫观，而且深入黔中腹地，在贵阳建立了大道观。”^{[2]379}明代以前，道教在黔中的传播可见文献者，也只寥寥数语，尚无更多的材料可资佐证。而明代以后，情况则完全两样，道教在黔中之发展与儒学、佛学相似，展现出迥然不同的格局。其根本的原因是，主政者俨然把道教作为一种“敷训导民”的治理手段，于是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都对道教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和推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成形的道教管理机构；各府、州、卫、所或者纷纷创设道观，或者颁发《道藏》，或者授给道士度牒，“致使道教在贵州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局面”^{[2]379}：

一是从中央到地方，明代在各级政府中均设有专门掌管道教的机构。此机构乃至与儒学、僧纲、医学、阴阳学诸司并列。管理道教的机构，在中央称之为“道录司”，隶属于礼部，“置左右司政各一人，下设演法、至灵、玄义、法官、赞教、掌书等职，并有龙虎山正一真人及太和山提点等，掌天下道士及经典、度牒”^{[2]379}。此外尚有“法官、赞教、掌书各二人。阁阜山、三茅山各灵官一人”^{[9]1817}。在地方，管理道教的机构称之为“道纪司”，各府道纪司内设有都纪和副都纪“州置道正司，县置道会司”。“僧、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神乐观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隸太常寺，与道录司无统属。”^{[9]1817}在今贵州境内，播州道纪司所建为最早，而贵州道纪司则于正统十三年（1448）建于贵阳。^{①11}

《魏书·释老志》称：“道教之源，出于老子。”^{[10]3048}葛洪《枕中书》认为道教起源于“二仪未分”之时的“元始天王”。《隋书·经籍志》则云：“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所度皆天仙上品……诸仙得之，始授世人。”^{[11]1091-1092}这些异常玄乎的说法显然属荒诞无稽之谈，较为可靠的说法是，道教的正式形成是在东汉的中后期，除了当时深重的社会危机、汉代统治思想的宗教化、佛教的启示和借鉴外，其产生的思想渊源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的确与道家思想直接联系，同时又与儒家思想（尤其是汉儒，而在政治伦理方面亦受《周易影响》）、先秦墨家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等等相为融摄。宋元以后，道教渐分为五大教派，即全真道、正一道、太一道、净明道和真大道。有明以来，后三者渐趋衰落，遂归于全真和正一两大教派。全真道为金代王重阳所创，主张儒、道、释“三教归一”，把儒家的《孝经》加上《心经》《道德经》一起诵读，提倡所谓修炼成仙，主张道士出家，尤重清规戒律。正一道又名天师道，由东汉末张道陵所创，以江西龙虎山为中心，奉持《正一经》，常持符篆，祈雨驱鬼，行“神霄雷法”，以事祈雨驱鬼和斋醮活动。道教在黔中原属空白，宋元以前，既无全真，亦无正一。据《悟真篇三注》所载：“（全真教道士），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沙、卢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此为全真教先于正一教而入于贵州的记录，不过具体时间未告之详。明代有于内地受到排挤的全真道人陆续流入，遂使黔中道教有所发展，而播州则是其传播的主要区域^①。此外思州也是道教传播较早的地区，自宋元始入而明代大盛^{②12}。

时又极力使禅宗与净土合流，并提倡佛家“不避世俗”，促使“教禅一致”，从而造成禅宗中兴的局面，出现了云栖抹密、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四大高僧”。这一时期，临济宗杨岐派大师密云圆悟（即天童悟）广招弟子，著名的如费隐通容、木陈道忞、汉月法藏、浮石通贤海、破石悟卓、破山海明等，在西南造成很大声势，则实非偶然，值得注意。

¹¹①《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僧道录司》及卷七十五《道纪司》。其余各处均未见于记载。

¹²①据《贵州通史》载：宋元以来，道教在播州已渐盛行，全真道士陈致虚收了若干弟子，建有一批宫观。入明以后，杨氏土司重修了宋代所建的玄妙观、玉皇观和元代所建的集贞观，还有真州的冲虚观、瓮安草塘的后岩观、黄平的福智观和平越的凝真观。杨氏又于正德年间在高坪北面的紫霞山建先天观，嘉靖间在桐梓城北一百二十里建黄沙观，万历间又于黄平五台山建玉虚府，在金凤山上建白帝宫，平越的高真观也是这一时期所建，道教盛极一时（见《贵州通史》卷2，第380页）。

②陈致虚也来此地招收了田琦等弟子。思州于明代建有崇林观，思南建有玄天观、玄帝观、云台观，婺川建有玄帝观，镇远建有北极宫、真武观、玉虚观、玄妙观和青龙洞，施秉建有玄都观、玉皇阁，黎平建有北极观、玉皇阁，此时道教的发展以思南、

道教传入贵阳的时间约晚于播、思二州，当在元代至元年间。其时彭如玉（江西庐陵道人）“创精舍，奉普庵祖师”，且寄居于贵阳大兴寺。此为道人入筑（筑：贵阳简称）有文字记载之最早者。尔后，云游道人纷至沓来，“于顺元城^⑬中建立了崇真观，明代改为大道观，内有石坊一座，坊上有‘大罗真境’四字，字迹苍劲，为郡人杨师孔所题。”^{[2]382}当时崇真观内据传藏有中央政府所赠《道藏》一套^⑭，由云游道人戴雪隐为大道观住持^⑮。雪隐主持将近三十年，“凡观其所当为者，无不尽其心”。自道纪司设于大道观后，观内又藏有朝廷所赐《道藏》，于是贵阳俨然而为之全省领导地位者，黔中各府，各土司道事，皆以省城为领项，省城庆典、祈求之事，皆聚而委之大道观。^⑯有了道纪司的设立，“正一教得以大力推行，从事‘雷法’者不乏其人，如贵阳人刘胆德，名噪一时。天顺初，宣慰同知宋然，又在其亲辖洪边地方，建立了崇圣观。贵阳附近的定番州建有真武观和东岳观。贵阳近郊的雪涯洞，明时建有玉皇殿，殿额为纯阳真人手迹，前为三宫殿，左有来仙亭。东门外栖霞山上的仙人洞，亦有道士常来，故名‘来仙洞’。”^{[2]383}

从贵州全省来看，明初以来，各府各县所辖卫所皆普遍建立宫观。查贵州明代各地方志中寺观之部，有见其：清平卫有玄真观，平越卫有高真观，龙里卫有紫虚观，新添卫有真武观，平坝卫有玄真观，都匀卫有三清观，普定卫有崇真观，安庄卫有紫霄观、高真观、玄天宫、玄真观，安南卫有玄灵观、南真观，普安卫有太清殿、通明阁、玉真观，毕节卫有崇真观，乌撒卫有真武观、龙泉观，赤水卫有高真观，永宁卫有文昌宫等等，贵阳老东门外之文昌阁，亦是其时正一道教鼎盛之见证。

一条以卫所为通道的道教传播线逐渐形成，这一现象与黔中之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有着直接关系。绝大多数卫所皆于明洪武始为军队驻扎之地，与多数学者所认同之观点一致，“道教之所以在卫所盛行，除了交通方便这一有利条件而外，最重要的是卫所官兵大多来自中原、江南或邻省……卫所官兵中本来就有不少信徒。为了稳定民心，顺应民情，各卫长官都很重视道教和修建道观，如永宁卫指挥俞镇建梓潼观，龙里卫指挥贾禄建紫虚观等。由于贵州的卫所均设在驿道上，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卫所为通道的道教传播线，横贯东西，纵穿南北，致使原先道士未至的地方如地处偏南的都匀卫和黔西北一隅的乌撒卫，也有了道教。”^{[2]383-384}

笔者以为，有关阳明入黔前贵州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三学的现状描述，对于对接大儒阳明的到来，和接下来所产生的惊世一悟，算得上是大背景下的学术与文化根源，亦即阳明龙场悟道与黔中王门得以产生的学术文化根源。阳明龙场悟道与黔中王门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历史的根源。

二、阳明入黔前之黔中文化人：基于对两汉至明中的考察

阳明入黔前的黔中人物，自汉以降，至明代中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考察：一为两汉；二为唐至元；三为明初至明中。

（一）汉代“黔中三杰”

镇远和施秉三地最盛。镇远地当湘黔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宋元以来即有湘湖道士至此，而城东的中河山环境清静秀丽，更是道家理想的洞天福地，故佛道两家相继至此，佛寺与道观交错而立。王阳明于正德初年出入黔中曾两番到此，除于青龙洞中讲学外，尚留下《镇远旅邸书札》一文，此系研究黔中王门的一手重要材料。

¹³⑬顺元城：贵阳旧名。

⑭据王训《大道观记》所述，正统十年（1445），英宗命道录司召集有名道士编辑《正统道藏》，书成，凡 5305 卷，于正统十三年（1448）颁布天下。当时，贵阳尚未建立道纪司，中央所赐《道藏》乃藏于崇真观中。

⑮据载，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陇富、宣慰同知宋昂，乃访举云游道人戴雪隐为该观住持，并上书请立道纪司，获准后推荐雪隐为贵州道纪司都纪，雪隐赴京领篆归，以司其事。又因道观故址狭隘，巡抚都御史蒋琳令有司筹集资财，“购得相邻处方千户废宅一区”，大兴土木，旬月告成，门庑室堂，尽合規制，乃更名为“大道观”。

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司》，王训《大道观记》。

有文献可查的两汉时期黔中学者，至少有舍人、盛览、尹珍三人，即所谓汉代“黔中三杰”，相对驰名。从文献所载可考，三人之文望，代表了这一时期黔中文化的最高水准，之后的唐至元、明初至明中（即阳明人黔前），黔中虽也出现过大大小小的读书人，凡《志书》中所记“功名”与“耆旧”，似乎少有能与上述汉代“黔中三杰”相比肩者。

对汉代“黔中三杰”，随之而后的唐至元以及明初至明中的黔中文化人的考察，于阳明入黔后黔中王门的形成、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关于土壤性甚而草根性问题的探索。因为我们在随后逐步深入的发掘中会发现，后来成为阳明弟子的黔中大大小小的读书人，其实许多都曾与一种关于“家”与“家族”“宗族”的缘衍不无关联。

舍人，又称犍为文学，二者到底何为人名，何为官名，不得而知。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列有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著有《尔雅注》，“文愈详备”。《隋书·经籍志》据梁朝阮孝绪《七录》，称犍为文学，亦谓其有《尔雅注》，惜亡于梁。随后又有“舍人”与“犍为文学”，乃同为一人或各为一人之论。据《绪录·注》，当属一人。钱大昕《隋书考异》亦云犍为文学即是舍人。然《左传正义》则文学与舍人并见，则似二人，翁方纲曾标此说于《经义考补正》中，谢启昆《小学考》为之解说，略云《正义》，乃并引异说，如《诗正义》中称舍人，《春秋正义》《尔雅疏》称犍为文学，陆玕《诗疏》亦然，可见《释文》以为一人，似无可疑。舍人（或犍为文学）为贵州遵义人，当为实据。《遵义志》及郑知同谓：汉制秩百石者例以本郡人充选。文学卒史秩皆百石，又《汉仪·注》四百石以下自除国中，足证舍人为犍为人，曾任本郡文学卒史。犍为治警，警为今遵义。舍人的《尔雅注》，在经学史上，留下相当影响，近人黎庶昌为赵晓峰学博辑犍为文学《〈尔雅〉注》作跋称：“《〈尔雅〉犍为文学注》，就余所见知，辑者：有余萧客本，有臧庸本，有王谟本，有马国翰本，有扬州叶心兰本，并晓峰而六。六家中惟马氏玉函山房本盛行于时，其题衔直曰汉郭舍人传张孝达之洞《书目答问》从之，是不可以无辩。马序云：《文选·羽猎赋注》引《尔雅》郭舍人注，张澍《蜀典》谓即与东方朔同时待诏，为隐语被榜呼之郭舍人也，此其题衔所据。不知《朔传》曰，幸倡郭舍人，陆氏《释文》曰：犍为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时待诏。”^①《尔雅》，唐宋儒家十三经之一，可见舍人于儒家经学贡献之大，以至于为其注者有达六家之多。郭舍人出生黔中，乃所谓汉代“黔中三杰”之第一人也。

盛览，字长通，牂牁人。盛览与汉司马相如同时，二人之间有学行之交往。据《遵义府志》载云：“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由此可知，盛长通乃是司马相如的弟子中唯一可考的贵州人。他在向司马相如就教后，根据司马相如所传旨意而作之《合组歌》与《列锦赋》，今已不可考。不过，盛览从学归来后，设教授之乡人，则有《汉书·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又据邵远平《续宏简录》）不过这里的“文教始开”，是就长通之乡，还是就整个黔中而言，尚须考察，因为我们接下来将要谈到的另一人物，东汉的尹珍，通常被誉之为黔教始开的第一人。盛览与舍人一样，都是从事汉学之小学功夫，他留世的著述，《旧志》中仅有存目：《赋心》四卷，汉盛览撰。览字长通，牂牁人，元狩间从学于司马相如，所著有《赋心》四卷，见《西京杂记》^{②④}。几处合共所载，可知盛览所著除《合组歌》《列锦赋》外，尚有《赋心》四卷。只是如今皆佚。

汉时“黔中三杰”中，如今声名卓著者，当属尹珍。尹珍其人，字道真，毋敛人，曾任荆州刺史，通常认为他才是首开西南文教之第一人。《后汉书·西南夷传》云：“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俞正燮《书〈后汉书·夜郎传〉后》亦云：“德清蔡补梅寿昌尝见语云，范书《夜郎传》桓帝时，牂牁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根据上述文献，有几点交代是没有出入的：一是尹珍问学的时间，俱在汉桓帝时；

^① ①《贵州通志·人物志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3页。此引可知，尚有舍人为郭姓一说。

②按：《西京杂记》止言牂牁可名士。考班书《地志》，牂牁郡十七县，止漏卧、平夷、同井、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藁、进桑、句町十县，为今云南之平夷、罗平、陆凉、河阳、通海、宁州、元江、文山地。据此可推，牂牁十七县之另外七县，应属今贵州西北部所辖，至于牂牁具体为何，暂无考述。

二是尹珍所师所学，所师为汝南许慎与应奉；三是因不知礼义故所学为经书、图、纬之类；然仍有问题交代不具体，如云“生于荒裔”“南域”等，确也含糊。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历史记载中的这个问题，因为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本文的主旨有所关涉，这就是关于尹珍的出生地，由于地方政府（一般指县一级）为着眼于本地发展而打造名人文化牌，故使直到今天，仍然有着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汉毋敛县地在今贵阳、都匀二府间，此说沿革于《牂牁十七县考》；一说认为今正安县北有毋敛坝，有尹珍宅故址；一说认为绥阳县有唐广明间尹公讲堂碑。上述三说之地，尤其是后二说之地，相距不过百余里，三地皆不出黔中范围，可知尹珍虽距今已然两千余年，确系黔中士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尹珍返乡讲学，就近几百里周游，自非止于一处，道真开南中之学，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食乡社，故此，三地说并不影响到本文的立论依据。至于其他说法则不能成立者，如《遵义府志》所言“而实事求是，正无庸因后人之私述易古籍之明文，致迁就附会如襄阳、昌黎之谬”。或许“南域”是一个更为广大的范围，即使是超出黔中，涉及周边如川、滇地，也并不与本题所议相违。又，遵义知府赵遵律有《尹珍考》，谓今之正安即唐之珍州，唐之珍州即汉之毋敛，然则先生汉毋敛，今正安州人也。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尹珍的学行，因这才是与本文之主论更为密切的内容。《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还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才，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这一段文字与前文所述内容一致。《华阳国志·南中志》续云：“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而世叔为司隶校尉，师生并显。”好个“师生并显”，表明尹珍已然在于当时之声望与地位，乃与其师应奉同列耳已。《华阳国志·南中志》又云：“尹珍宦达惟言世叔，师生并显不及叔重。”当然，许叔重乃汉时一代小学大家，千古有名，能够与之接踵其后，也算是不小的荣耀了。至今黔中士人为纪念尹珍，于贵阳扶风山建有“道真祠”，无独有偶的是，此道真祠与阳明祠共建于一处，统称为“阳明祠”。此“阳明祠”为清嘉庆十九年（1914）所建，迄今已逾二百年。“阳明祠”祠中有祠，乃为“阳明祠”“尹道真祠”和“扶风寺”二祠一寺，黔人将“阳明祠”与“道真祠”共建一处，标示了黔中历代官府与士人对尹珍与阳明这两位彼此相距一千三四百年的文化人对黔中做出的文化贡献的认可。但是，在尹珍和阳明之间的这一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再难找到如此这般重量级的人物。前述所谓“无理学名臣可考”，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在这一千年中，大大小小的读书人，也还是可以大概地数上一数的，因为其对于后来出现的黔中王门弟子的渊源与成分来说，依然自有其关联性的存在。

（二）唐至元的大小读书人

从道理上来说，无论是有功名的士子还是无功名的耆旧，都可以纳入大大小小的读书人之列。说到所谓“大读书人”，汉代“黔中三杰”自然可以担其任，然自唐至元的黔中读书人，笔者以为，皆只算得上是小读书人了。关于“小读书人”的提法，张艺曦在《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一书中有一大致的描述。我们不需要对这一特殊概念做出十分精准的定义，只需通过下面笔者根据地方志书中所提取的现成材料，就能够基本把握住这个指称。“小读书人”就局部而言，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地方的精英，地方精英在他所在之地扮演什么角色，他与他的家族有何关联，他的学行在他的家族内或在他所处之地产生着什么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如何传承下来，其对后来的阳明黔中后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的确值得一察。

唐之前的晋，有毋敛人谢恕，字茂理，《遵义府志》载其称“忠义冠军将军”，除“至忠义二字乃常《志》人物品目”外，尚有“文学、政事之比”而名。唐代赵国珍，牂牁之苗裔也，天宝中以军功累迁黔府都督兼本管经略等使，唐代大诗人李白作有《送赵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诗，王琦《注》，疑黔府中丞即国珍，故按：虽累官，无功名。据《明一统志》和《四川通志》，有宋冉从周，遵义人，举进士，时呼为破荒冉家，历官为珍州守，有善状。《四川通志》还记有冉举进士的具体时间：“从周，嘉熙二年（1238），周坦榜进士。”根据现今所获文献资料所断，遵义人冉从周举进士，岂止是“破荒冉家”，实乃破荒黔中矣。又《遵义府志》云赵高峰，今桐梓人，官至长沙太守。元祐八年（1093）告归，敕赐所居名青莲院，著有诗集，今亡。宋时黔中未设置行省，全境由四大土司分辖，北有杨氏土司，西有安氏土司，南有宋氏土司，东有田氏土司。东部和东北部，均由田氏土司所辖，思州乃其府地。田祐恭，思州人，生有明识，为番部长。《康熙通志》载：“祐恭，字子礼，思南人。有胆

识，为番部长。政和间被召入觐，拜伏进退不类远人，帝嘉之……勋业甚著，子孙世其官。”田氏为思州一大姓氏，在思州所辖八府中，田氏读书成为风气，也产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读书人，明中后期思州作为黔中王学五大重镇之一，李渭门下就有不少田姓读书人。黔北杨氏土司所辖之播州，先是隶属四川，明以后划入贵州，杨家乃一大姓族落，故有读书传统。说到杨氏的读书传统，要追溯到他们的祖先唐代太原人杨端。时南诏陷播州，杨端应募而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五代以来世袭其职。五传至昭无子，以族子贵迁嗣。又八传至粲，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宪，皆仕宋为安抚使。至元十三年（1285）宋亡，元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授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卒年四十三，赠推忠效顺功臣平章政事，追封播国公，谥惠敏。

邦宪的儿子杨汉英，才算得上是杨家南下播州以来的一个大读书人。杨汉英，字熙载，又名杨赛英不花，“赛英不花”，赐名也。他小时候的故事流传至今：小汉英五岁丧父，至元二十二年（1285），母亲田氏携至上京见世祖于大安殿，帝呼至御榻前，熟视其眸子，抚其顶者久之，乃谕宰臣曰：“杨氏母子孤寡，万里来庭，朕甚悯之。”遂命袭父职，锡金虎符，因赐名赛英不花，这一年汉英方九岁。三年后的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二岁的汉英再次入觐，帝见其应对明敏，称善者三，复因宰臣奏安边事，帝益嘉之。是年改安抚司为宣抚司，授宣抚使，寻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宗即位，赛英不花两入觐，赠谥二代。以后连年，赛英不花均有建树，无论是赴募国事，还是地方治理，成绩卓著。据《〈元史〉本传》，至大四年（1311），赛英不花加勋上护军，诏许世袭，时播州南部卢崩蛮内侵，诏赛英不花会思州宣慰使田茂忠讨之，赛英不花不幸以疾卒于军中，年方四十，赠推诚秉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播国公，谥忠宣，子嘉贞嗣。重要的是，赛英不花作为读书人，非但究心于宋代理学，且留下皇皇之著。《〈新元史〉本传》记：“汉英究心濂洛之学，为诗文典雅有则，著《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卷。”宋濂《杨氏家传》称杨家子弟“嗜读书，择明师授子经，四方士有贤者辄厚币罗致，岁以十百计”。清人袁楠作《书杨安抚训子诗后》，盖能表彰杨氏家族的传世书香：

周鲁公传三十四世，夫子记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所不忍言，是则伯禽以后为无闻矣。家训之严，莫胜于袁柳，若包孝肃、司马文正庭诰俨在，至诸孙而靡传。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夫岂徒言哉！播州杨忠宣公，其子锡爵，作诗训示，韦玄成之。诗有曰：“于戏后人，惟肃惟谨，无忝厥祖，以蕃汉室。”公之诗有焉。今宣慰君盛年执讲问学，日积金玉厥躬，以承休誉，克昭乃显祖，视鲁公世家实为有光，尚勉之哉，则忠宣公实不朽矣！^{[12]19}

由此可知，在明代之前，贵州作为蛮荒之地，凡有文化的读书人极少，且基本集中于土司之大家族中。然四大土司中，以北部播州的杨氏土司大家族和东部思州的田氏土司大家族，因地缘文化辐射之关联密切，他们在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方面得天时地利之便，因而比之西部安氏和南部宋氏两个土司族落来说，能够有较多的文化人或做官或著文者，得以传载于地方志书而流传下来。像播州的杨氏家族和冉氏家族，思州的田氏家族、罗氏家族，皆算得上是家学渊源，代有传人。

（三）明初至明中的大大小小读书人

贵州算得上是个移民省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第一次就发生在明代初年。^①时朱元璋委傅友德大将军率三十万大军赴黔滇以扫元遗，除携带大批家属外，还随之涌入了一批批宗教文化士人，沿途修建了大量卫所、屯堡、学校乃至宫观庙宇。中原的文化优势在逐渐地部分地替代原始荒野的同时，读过一些书的和正在开始读书的小文化人渐渐多了起来。这部分人大致由两类成分组成，一部分是因迁徙而来的军人、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他们在带来文化因素的同时，也在这里为取得功名而继续做出努力；一部分是当地的富户子弟因条件发生变化而开始有更多的人进入庠序及塾院，除逐步建立起来的州学、府学、县学外，民间的私塾也渐渐地多了起来，为这部分人变更和提升身份奠定了基础。不过，我们还是依照明初至明中，其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来大致回顾一下各类志书中提到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大小的读书人。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志书中留名，一定在当时来说已然跻身于地方上翘楚之列。

王训是我们将要提到的明初黔中第一人，其字继善，号寓庵，贵州卫人，《贵州通志·人物志》对他评价有八字：“博学知兵，诗文雄伟。”他出生在卫所，军人驻扎的地方，故可推知其先或本人乃内地随军迁徙而来。又《志》云其“宣德乙卯（1435）

举云南乡试”^{②15}，据此推算其生年应在十五世纪之初¹⁶ 正统间，王训得都督吴亮荐，拔贵州儒学训导，其教法严整，文化以兴，足以绵蕞后来，著龟多士。王训这个读书人不仅讲教致学，还颇有军功，正统十三年（1448），麓川思仁发叛，尚书王骥总师讨之，辟训往佐，卒获渠魁。十四年（1449）苗民攻围新添、平越等卫，尚书侯璉亦辟训赞画，不阅月，围顿解，论功升教授。训强壮时，当道屡列荐，皆引避，晚以子官推封武略将军，卒年八十。

王训的文望，据莫友芝《黔诗纪略》：有文集三十卷见《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载其集曰《寓庵文集》，旧记称其诗文雄伟，而清《四库全书提要》不存其目，惜佚已久矣。今可见者唯《月潭寺》一记，《嘉瓜》一颂，律诗五篇，未必其精要，而《客夜》三诗，当中年潦倒，意气犹存，投老一毡，知音难索，所谓暴客尚存，奸谀不死，盖骥幕之虚功无实，犹有余恨也，其诗境之苍凉雄郁亦可见一斑。明黔开草昧之功不能不首推王训也。贵阳城北二里许白岩山有台，叠石为之，傍凿池绕以花木，王训曾读书其间，今犹称读书台耳。

贵州卫设地，即今之贵阳，贵阳不仅出了个王训，还出了个詹英，詹家是贵阳一大家族，其子其孙，竟然与王阳明搭上了重重关系。

詹英，字秀实，贵阳籍举人（《乾隆志》记其明正统戊午举人），授会川（今遵义汇川）卫训导。他与前面提到的王训一样，同样与时任兵部尚书王骥搭上了关联¹⁷ 时滇有麓川之役，詹英上疏边务十三事，悉行之。然王骥凡三征麓川，卒不得思机发，议者咎骥等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而会川卫训导詹英抗疏劾之，大略谓骥等多役民夫，贪功黩武，劳师费财，上大异之，诏即往参其军，英恐事多掣肘，诣阙辞，公卿争识其面，或欲荐为台职，值己巳（1449）之变，遂止。英考满迁河西教谕，疏荐可抚蜀者侍郎张固，上可之，蜀赖以安。英卒后，所著有《止庵集》于《康熙通志》存目，全本已失传，唯见一诗、一疏见莫友芝《黔诗纪略》而已。詹英之孙詹恩，弘治八年（1495），举人，十二年（1499）进士，恰巧与王守仁为同科进士，他们之间的故事留作后文交代。

明代贵州的第一个进士是赤水卫人张谏，字孟弼，其先自应天句容来籍。《嘉靖通志》云乃父伯安，读书好义，以孝友清俭为时所重。谏富文学，有雄思，任监察御史风裁凛然，累官太仆卿以严能闻。《乾隆一统志》云“谏少有志节，正统中由进士授行人。丁母忧归，哀毁骨立，庐墓三年，有产芝^{②16}之异。服阙，拜御史，督福建银课，时被寇后余孽间作，谏剿平之。父卒，复庐墓，芝再产墓侧，人咸异之，官至太仆寺卿。”莫友芝《黔诗纪略》对张谏的学行做了陈述：“孟弼少有志节，喟乡里自宋元来，鲜以文章经济闻者，乃北走蜀学于刘仲珩，微言妙义，能辨析无滞，仲珩喜甚。适刘忠愍廷振奉使至蜀，仲珩见之，忠愍亦大奇之。”张谏的科举道路可谓顺利，他于宣德十年（1435）至京师师事忠愍门下，于正统四年（1439）成进士授行人。

据史料记载，明代贵州有举人始于永乐辛卯（1411）、甲午（1414）附云南、四川乡试（时贵州未置科场）之刘宏（永宁人，官知县）、廖沈（播州桐梓驿人），而张谏为有明黔中进士之第一人。自是，人物汇起，而赤水为盛。其相次成进士者，天顺元年（1457）则陈迪，八年（1464）有朱谦，成化八年（1472，是年王守仁生于余姚瑞云楼）有徐节，有茅鉉。陈迪、朱谦、茅鉉并关御史，有声。朱谦擢江西佥事，吏民不敢干以私复有真宪臣之目。刘宏、廖沈、陈迪、朱谦、茅鉉等人“诗俱无传”，惟“孟弼犹存一篇”。

根据几种《志书》之记载而做出的综合统计，从正统四年（1439）张谏为黔中进士第一人起，到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入黔前的这七十年时间里，贵州一共产生出 24 名进士：

1439：张谏

¹⁵①第二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内迁”，第三次乃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下”与“支黔”。

②当时黔省未设乡试，黔中士子皆远赴云南，于昆明与云南士子同考。贵州独立设乡试科考，是在嘉靖十四年（一说为十六年）。

¹⁶①芝，即芝草，古人以芝草绕墓而生，群鸟环墓而飞，喻后人孝感之意，其墓称“孝芝墓”。

1442：秦颖

1445：申祐、王敞

1448：黄绂

1454：易贵、周瑛

1457：黎逊、钟震、彭果、陈迪

1464：赵侃、朱谦

1469：杨遵

1472：徐节、李珣、俞玘、茅鉉

1484：朱壁、熊祥

1487：郭珠

1499：詹恩、汪大章、潘垞

为了能够更合理地说明黔中王门产生的本土基础，本文拟将上述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位读书人再行做出分析。这是因为，这几位人物不是在《康熙通志》《乾隆一统志》中有传，就是在《嘉靖通志》《贵阳府志》《黔诗纪略》等较为重要的志书中有传，可见都是一些相对较有分量的读书人，即秦颖、申祐、黄绂、易贵、赵侃、徐节和詹恩七位。

秦颖，字士昂，贵州前卫人，登正统壬戌（1442）进士，累官至云南参政，履正奉公，旬宣不怠，而谦牧之德，尤为乡邦之所重也。《乾隆一统志》说他是贵州宣慰司人，成进士后，授行人，迁礼部员外郎，天顺初奉使滇粤咨民隐，归疏于朝，上多采纳。历官云南左参政。铁索箐贼起，攻破州府，颖袭擒之，会御史审决死囚，忽万鸟飞聚省堂，驱之不散，颖疑有冤，详鞠之，释无辜者三十九人。《康熙通志》亦载有事迹，说秦颖一次巡金齿，渡潞江，忽风涛大作，舟中人悉惊怖，独秦颖面不易容而正色赋诗云：“若受赃私并土物，任教沉向潞江中。”风宁舟济，人谓忠诚所致，后卒于官。除几首诗外，秦颖未见有多少文字留存，恐皆佚矣。

申祐，字天锡，贵州思南府务川人，正统三年（1438）乡试，正统十年（1445）成进士。申祐小时候为到思州府读书，每日身负干粮徒步往学，暇时又常跟从父亲田间务活。有一次，父亲被山中老虎所衔，申祐持杖挺身奋力击之虎，“虎逸，父免哇焉”。申祐进士即出四川道监察御史，“以謇谔闻”，虽不善言辞，却以正直见称。他常常出巡庐凤、安庆诸府，暇时则进诸生讲论经史，讲到忠孝节烈等事例时，尤其恳切动人，听者多感动不已，以至于在他返还都城时，诸生相送甚远。

申祐之死，甚为壮烈。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瓦剌也先因怒于太监王振压低马价而大举入犯中原，塞外城堡均被其攻陷，形势危急。于是王振挟帝大驾亲征，举朝大臣未能制止。自太师英国公张辅以下大小官员数百人，行至土木堡地方，敌已逼近，守隘诸将

纷纷以败战死，这就是史上闻名的“土木堡之变”。明军面临困境，为脱身计，正统皇帝“命选群臣貌似己者，众推申祐”，

于是，天锡“遂冒乘輿，师溃遇难，扈从数百人惟数人得脱，而帝蒙尘以全”。然而申祐如此忠烈事迹，却在后来所建的土木堡纪念馆内无任何体现。

对于申祐之以忠孝节烈称于当时，死后却未得以公正对待的情况，黔中王门理学三先生之一的李渭之门人，同是思南人士的萧重望，于百年后为其愤而鸣屈，题奏《缺漏申侍御土木堡忠诚庙名位疏》（见《黔诗纪略》）称：“表扬忠孝，以鼓天下贤豪人心，以励万世地方风俗事。”但不幸的是，“顷者巡历土木堡见忠诚庙，忠愤之念勃勃欲发，竭诚诣词展拜，亲目牌位姓名，系正统时死难之臣，独未见申侍御忠臣牌位，目击心伤，寸肠碎裂万断已”。萧重望文中列举申祐“其节有三”：“臣请为陛下言之：祐在童时居乡，随父之田，虎忽爪父去，祐执杖击虎，脱父命于虎口，事亲之难其一。及乡试于胄监，国学祭酒李时勉以言事件旨枷国子监门，祐倡六馆诸生石大用等挝鼓愿以身代师难，上霁天威得释，事师之难其二。迨至土木之役，王振惑帝亲征，两军对垒，危亡旦夕，上命群臣中选有与朕貌相合者，不妨代朕乘輿，庶朕脱难。众推申祐御貌与君貌若相似，即命以身代天躬乘銮远驭，保帝驾以全归，事君之难其三。”又有礼部尚书程敏政议草《为申侍御代驾死难苦忠扼腕不平书稿》，可见公道恒在人心，天理不容泯灭。终于有了结果：忠臣申祐代驾死节，忠孝名臣实迹有据，本当优恤，速令入祠享祀，谥荫耳耳。其实如申祐这样的读书人，不仅作为黔中人物十分难得，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读书人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比申祐晚一科的进士黄绂，也是一个值得一书的读书人。

黄绂，字用章，其先封邱人，曾祖徙平越，遂家焉。绂登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除行人，历南京刑部郎中，性刚烈，人目之曰“硬黄”。地方上有一大猾谭千户者，占民芦场莫敢问，绂夺还之民。成化九年（1473）黄绂迁四川左参议，久之，进左参政。按部崇庆，旋风起御前，不得行。绂曰：“此必有冤，吾当为理。”风遂散。二十二年（1486）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弘治三年（1490）拜南京户部尚书，言官以绂进颇骤，频有言。帝不听，就改左都御史。黄绂历官四十余年，性情耿直，不容小物，但他自己能做到操履洁白，有所建树。弘治六年（1493）乞休，未行而卒，《明史》本传有记。作为贵州人的黄绂，在外做官时间较长，他的后裔寄籍吴中，无从访求。据《黔风旧闻录》，称其遗书仅《飞泉》四篇，高古浑健，足追汉魏。《黔诗纪略》云其：“平生所著奏议诗文悉焚不留，惟见方志载《平越卫学》一记、《飞泉》《月山》等五诗而已。”还特别称赞道：“公为有明贵州名臣之冠，劲节清风，洁巧闾里，诗文本不足言，然而零篇小咏亦自当行，片羽吉光弥增擎宝矣。”莫友芝最后品黄绂：晚岁好道，自号精一道人、蟾阳子，复有《参同契注》，未见。与王阳明同年的李梦阳，与黄绂为至交，撰有《尚书黄公传》，亦云其有《参同契》注本独存。不仅郑晓有《都御史黄公传》，甚至查继佐《罪惟录》、傅维麟《明书》，都有为黄绂作传。

易贵，字天爵，贵州宣慰司人。《图经》上说他性通朗刚正，淹赅载籍，为文善叙事，登景泰甲戌（1454）进士第五人，筮仕职方主事，两奉使命，升礼部郎中。易贵出知辰州府，崇学校，恤民隐，遇事明而能断，不怵于势利，有古循良风。与前面提到的几位读书人极为相似的是，在做人上的确堪称上流。《图经》还说他归田后，闭门校书十余年而卒，所作有《竹泉文集》十五卷，《诗经直指》一卷，《葬书》一卷。易贵无疑算得上是一个儒家学者，在阳明到来前的明代中期，他闭门修书十余年，著述已不算少，但只有《黔诗纪略》稍详，先说他“撰《辰阳志》若干卷，以老乞归，闭门著书十余年始卒”，又说他“淹贯群经，尤长于《易》，尝构别业于贵阳北二里许，读《易》岩谷中，至今犹称点易岩。”^{①7}省、郡《志》载其著述但云有《群经直指》《竹泉文集》。”考《明史·艺文志》“易贵《诗经直指》十五卷”，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易贵《竹泉文集》十五卷”，朱检讨彝尊《经义考》亦载：“易氏贵，《诗经直指》，佚，记长老言，易氏《易经直指》亦十五卷，今皆未见，其他《经》并卷数亦不可考矣。”依然是莫友芝的评价比较到位：“黔人著述见于史者，别集始于王教授（按：即王阳明），经说始于先生（按：即易贵），并明一代，贵州文教鼻祖，其开创之功，不在道真、长通下。”将易贵与阳明并提，又称其文教开创之功不在尹珍、盛览之下，这个评价已经相当高了。所以莫氏以为，当“遍访藏家求两先生著述与好事传之，乃大快也”。他说他曾经于“道光壬辰（1832）冬，友芝计偕经辰州，适修郡学正殿，先师、四配、十哲犹旧像设，校官诸生方检点贮器，散置庭庑间，闻余黔人，乃指圣贤像及最旧器相示曰，此君乡先生天爵易公遗也。又谓易公守辰，教士馭民一如家人父子，曲直往诉一言立决，案牍无留者，盖心先服之矣。有明辰阳守令循者殆无逾易公，辰人犹喜道其杖石以济被盗婪人，因以得盗一

^{①7}①点易岩，即位于贵阳城北六广门右侧上坡处，惜岩已劈。

事，此特公小权数耳。”

为此，莫氏叹赞云：“噫！馀三百年而循泽称道不衰，经术入人之深，诚非一切之所能及也。辰阳留别诗蔼然儒言，安得《竹泉集》一尽其蕴耶！”^[13]王阳明有一首诗名曰《夏曰登易氏万卷楼用唐韵》，作于正德九年（1514）夏天，诗中易氏即易贵也。该诗描写了夏天六月登楼所见景色和作者感受，表达了作者因离家万里，关塞阻隔难归的惆怅心情，易氏万卷楼在贵阳老城（内城）北，由时任知府的易贵建以藏书，为明代贵阳名楼，今已不存。既然是藏书楼，必然吸引阳明前往，阅书是一方面，登临更是一方面，二者兼顾，自然大发诗兴：

高楼六月自生寒，

沓嶂迴峰拥碧阑。

久客已忘非故土，

此身兼喜是闲官。

幽花傍晚烟初暝，

深树新晴雨未干。

极目海天家万里，

风尘关塞欲归难。

说了易贵，就来说说赵侃。赵侃，字至刚，贵州普定卫人。天顺三年（1459）举人，八年（1464）成进士，授吏科给事中，累升都给事。《图经》云其忠谨耿直，时政得失，军民利害，累形章疏，率见举行，升通政司右通政，兼掌五军浩命事，终于官，朝廷赐以谥祭。赵侃年五十八卒，有《草亭略》一书可述，惜不传。

景泰首科，诏云南乡试不限云贵份额，据文字通校为去取，结果这一年贵州大获丰收，赵侃举第二，平坝卫卫兰第三，普定卫张清第四，兴隆卫周瑛、宣慰司钟震并有文名，称一时乡科之盛。钟震后来还举天顺丁丑（1457）进士，官工部主事。

还有一位值得一书之人，谓徐节，字时中，贵州宣慰司人，他中进士的那一年，乃成化壬辰（1472），浙江余姚的王守仁方才出生。与后者一样，徐节于正德初年（1506）亦遭权阉刘瑾的打压。

徐节的祖籍乃安徽绩溪（今黄山市），明初，其曾祖徐伯逊谪戍贵州，后定居于贵阳。徐节自幼聪颖异常，六岁入乡塾，所阅之书，过目成诵，少即习《易》，为巡抚陈泰大为称奇。陈泰乃福建光泽人，举子出身，惜才如命，对徐节如此才能倍加赞赏，乃惠赠徐节《易义》诸书，助其解惑释疑，并将其选送县学深造。正统十三年（1448），节父徐资“参谋戍幕，歿于战阵”，面对家庭丕变，徐节唯有发愤自强，乃取经、史、子、集读之，不舍昼夜。天顺三年（1459），徐节举云贵乡试，之后即赴京会试，虽几次未及，却矢志不改，终于成化八年（1472）高中进士，授河南内乡知县。由于勤于政事，爱民如子，深得内乡民众交口称赞，成化十三年（1478）升福建道监察御史离任河南时，内乡民众夹道不舍，滴泪远送，久不释手以至撕裂其衣。徐节于福建监察御史任上，三上奏疏，劾锦衣卫牛循之不法行径，上纳，牛乃法办。成化十九年（1483），徐节入掌河南、山西二道，又弹劾权相万安之不法，时人赞其“风裁凛若”。弘治元年（1488），节迁直隶太平知府，时生瘟疫，节亲临疫地，以“抚疗”之法救民水火，其效乃佳。弘治十一年（1498），升云南左参政，太平百姓遮道挽留，又现当年内乡场面。由于治

滇之功卓著，朝廷授其“录功食正二品俸”。弘治十五（1502）至弘治十七年（1504），先后任广西左布政使、广东右布政使。

和王守仁一样，正德元年（1506），徐节遭受了其平生第一次重大波折。当兵部主事王守仁为救谏官戴铣等人受廷杖而谪戍贵州龙场驿时，已就任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提督京师的徐节因“廉能公谨，善誉四达”正待进一步提拔时，却因为“忤犯刘瑾”，被此权阉假传圣旨而“削职罢归”，遭到与王守仁相同的下场。既然削职罢归，按理徐节就应当回到了贵州，当王守仁于正德三年（1508）春至正德五年（1510）初逗留贵州期间，徐节即以其老迈之身简藏于贵阳家中。惺惺惜惺惺，初至龙场始得草庵而居之的王阳明，闻知徐都宪^⑮蜗居贵阳老城，自然高兴得忙不迭要去府邸拜望这位前辈，此时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二位忘年之交，两个被贬之人，怀着彼此仰慕的欣喜，同游贵阳之南庵，王阳明作诗《南庵次韵二首》^{[14]853}：

其一

隔水樵渔亦几家，

缘冈石路入溪斜。

松林晚印千峰雨，

枫叶秋连万树霞。

渐觉形骸逃物外，

未妨游乐在天涯。

频来不用劳僧榻，

已僭汀鸥一席沙。

其二

斜日江波动客衣，

水南深竹见崖扉。

渔人收网舟初集，

野老忘机坐未归。

渐觉云间栖翼乱，

愁看天北暮云飞。

^⑮①都宪，巡抚的别称、尊称，徐节被贬前曾任山西巡抚，故有此称。有学者著《王阳明黔中考》，称徐都宪乃徐文华，误也；又有学者著《王阳明贵州诗》，亦称徐都宪为徐文华，以误传误也。

年年晚岁长为客，

闲杀西湖旧钓石几。

二人诗来辞往，甚是相契，王阳明又作《徐都宪同游南庵次韵》^{[14]854}一首：

崖寺藏春长不夏，

江花映日艳于桃。

山阴入户川光暮，

林影浮空暑气高。

树老岂能知岁月，

溪清真可鑑秋毫。

但逢佳景须行乐，

莫遣风霜着鬓毛。

他们不仅是诗友，而且还是书友。徐节流传到今天的书法遗迹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在当时却是一位在书法上颇有影响的人物，“通篆、隶、行、草诸体——乡邦楷范”。他擅长各种书法，为当时士人视为学习的榜样。从文献中对他的记载看，他在当时已是明代贵州著名的书法家了。以下一段考古发掘，见证了王阳明与徐节老先生的亲密合作。公元 1955 年在贵阳旧城西出土了《明詹木妻越孺人墓志铭》，这块墓志铭上的志文作者是王守仁，汪汉用楷书录入，刻在纵横都是五十厘米的石块上。这块墓志铭刻于正德年间，应该就是王阳明居黔的这段日子里。志盖上的“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十一个篆字为徐节所书。这是目前仅见的徐节的字迹，他的字与他大致同时的王木的篆字风格相比较，各具特色。王木的篆字特点是方圆兼及，方中寓圆，圆中见方。而徐节的篆字，则比较多地用了方折之笔，并且在字的造型结构上，其笔画往往向左右伸展。上述十一个字中，“明”“越”“人”“母”“孺”等几个字，明显地都具有此倾向，表现出舒展而方硬、挺括而细劲的特点。王阳明喜于与类如徐节这样的鸿儒交往，必然给他贬谪的时光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更何况二人同有贬谪之身呢！所以，至今仍保存在贵州省博物馆的“詹母越氏墓碑”上明显地镌刻着如下字样：

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

赐进士出身余姚王守仁撰

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郡人徐节篆

乡进士奉直大夫云南北胜州知州嘉禾汪汉书

喜讯传来，正德十年（1515），当刘瑾篡政阴谋败漏而“诏磔于市”，王徐二人亦同时迎来了新的生机，王守仁升任江西庐陵知县，徐节则奉诏官复原职，这时的徐节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不久就因年老体弱而辞官返里。“积学以致荣，砺行以范世”

的徐节告老归林后，过着游心于文瀚的简朴生活，他“慕陶潜之所为”，作“挽歌行状”以示门人。其为人旷达，待人以礼，常常与二三绅耆硕儒觞咏于泉石之间，把酒临风，吟诗作赋，挥毫泼墨，更尤善篆、隶、行、草诸体，每每门生鳌集，玄歌不绝，起黔学风气于一时一隅耳，真所谓“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德十五年（1520），这个天生傲骨，一生正气的黔人离却人世，享年八十有六，给“天下想闻其清节”的人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还应提到一个人，即前面谈到的詹英，他的孙子名叫詹恩。詹恩字蓁臣，贵阳府人，他与王阳明有着多重关系。弘治十二年（1499），詹恩与王阳明同科进士，王阳明观政工部，詹恩则试政户部，这是第一重关系；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到贵阳，欲拜望这位老同学，不意詹恩先故，其母越氏亦故，詹恩之弟詹良臣则拜师阳明，这是第二重关系；王阳明在黔期间，与詹家多有往来，詹恩之母去世，阳明受托作《詹母越氏墓志铭》以记，这表明彼此之间关系如此，并不一般。

从明初到明中的黔中大大小小的读书人，主要从之于两个来源：一是世居之富户子弟，特别是黔北播州之杨系世家、黔东思州之田系世家，可充牛耳；另一则是明初举家大迁徙而来的军伍、官宦、商贾之家，这些人家在黔中出生的第一代子弟长成之时，正是他们中的代表张谏长成而举进士（1439）之日。这一时期黔中的问学空气比起汉末至元的一千年来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不可否认，我们从后来黔中王门诸子的构成可以看到，这一问学空气的变化，的确算得上是推动黔中王门产生的一个有力助因。

[参考文献]:

- [1]贵州省宗教学会. 贵州宗教史[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
- [2]《贵州通史》编委会. 贵州通史: 第2卷[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 [3]张学智. 明代哲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4]陈 来. 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5]钱 明. 王阳明及其学派考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6]郭子章. 理学传[M]//黔记.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 [7]索晓霞, 敖以升, 钟 莉. 贵州: 永远的财富是文化[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 [8]郭子章. 学校志[M]//黔记: 卷十六.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 [9]僧道录司[M]//明史: 职官三.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0]魏 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隋 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12]人物志[M]//贵州通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13]莫友芝. 黔诗纪略[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14]王守仁. 王文成公全书[M]. 王晓昕, 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